

序 言

几年以前，普雷格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著作《未来的欧洲模式》。此书阐述了我对欧洲前途的看法。它是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写作的，反映了当时欧洲的演变趋势和发展潮流。

自那时以来，国际社会有了更大更快的发展。欧洲联盟开始了它的经济货币联盟。它还在设想进一步扩大，把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吸收进来。

在欧洲，像在世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国际主义的趋势是十分强烈的，似乎是不可遏止的。然而在幕后，由于许多国际经济力量的兴起，居民对这种发展的某些方面（如果说不是整个过程的话）打上了问号。

本书试图对危及国际主义的许多因素加以分析。它还试图指出可以用来控制国际主义的某些因素，从而缓解世界各国居民中对这种演变表现出来的担心。

我认为，一种新的、更加可怕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正在取代国际主义，这种现象的兴起比大多数人想象

得要更加现实、更加尖锐。因此，需要做出坚决的努力来保持现行的国际体系，这种体系 50 多年来为世界作出了杰出的服务。

本书反映了我的个人观点，同我现在和过去曾经有过联系的那些机构的立场不一定是一致的。我的秘书玛丽·纳拉雅南对我的手稿的完成给予了大力协助，对她谨表示谢意。

第一章 引 子

文明史上反复出现的潮流之一就是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不断摆动。

由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显示屏上似乎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自 1945 年以来，我们的文明一直大力追求着国际主义不断增强的目标。在历史上很少有这种情况：这么多的人在这么长的时期内认同一个共同的政治、经济目标。

经济和贸易已经自由化了。自由的商人不必在充满石头的葡萄园里辛勤劳作来为自己的事业辩解了。听众是来听取已经采取的决定的理由的。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说服。他们已经确信无疑了。

在国际范围内建立了政治机制来控制经济、贸易和资本的流动，在 20 世纪后半期还控制跨国公司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制反映了由下而上的做法。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让·莫内在 1949 年提出的、由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加以执行的第一个步骤显然带有明确的

政治目的，即：使法国和德国的经济结构一体化，以阻止法德之间发生另一次战争。如果爆发那样的战争，那将是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第四次战争了。但是，除了那个步骤以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所有政治基础设施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赶上整个世界的发展。贸易和资本的流动从国家的范围转向国际的范围。各国的立法过程越来越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了。立法试图加以控制的经济现象发生在国际范围内，因而逃避了各国的立法。为了保持政治控制，立法过程不仅有必要，而且不得不像它应当加以控制的经济现象那样，也推向国际水平。各个国家不知不觉地、默默地、有时是勉强地也跟着这样做，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是很大一部分）主权。

安全和军事方面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世界一直生活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这种局面，两个超级大国都在自己的周围建立一些被保护国，后者在不同的程度上愿意支持自己的超级大国做出的决定。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局势发生了变化，使得世界更加趋向国际化。维持和平（甚至缔造和平）、控制危机和人道主义援助成为注意的焦点。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前南斯拉夫。欧洲联盟、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先后去那里缔造和平，同时为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之间互相残杀而形成的难民提供食品。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信息和娱乐基本上是国家
的特权。而到了 20 世纪的后期，这些东西则抛弃了国家
的束缚，成为国际现象。各个民族——国家再也挡不住
电视和无线电广播的传播，无法向自己的公民隐瞒真
相。高技术成了伟大的解放者，把那些同外界隔绝的人
从孤陋寡闻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种情况使独裁制度纷
纷垮台：伊朗的国王、中欧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甚至
“邪恶帝国”苏联本身。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
可以得到外界的信息，而且还因为外界的信息揭示了一个
巨大的秘密：他们国家的统治阶级向自己的民众撒谎
几十年。统治者丧失了合法性，被当场抓获，很快失去了
政权。

到了 20 世纪末，主导的潮流是愿意放弃过去的主
权，而代之以制度化了的国际体系的影响。事实上，虽
然“主权”这个字眼作为常规智慧的象征仍然受到尊
敬，但是，它也正在慢慢寿终正寝。今后继续坚持本国
的立法，不见得合时宜，因为这些立法纸面上看起来不
错，实际上变得毫无用处。一些国家可能仍然（有些国
家甚至很喜欢）推出一些限制跨国公司活动的立法，从
而使得这些公司到别处开展业务。同样，一些国家可能
对空气污染或核电站的安全措施采取严格的规章制度，
结果发现周边的国家可能仍然在污染空气或者仍然在
建立核电站，因为那里的规章制度比较宽松。

正在出现的趋势是。不是放弃主权，而是共享主

权，实施一些共同做出的决定。通过这样的做法，各国就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避免成为安徒生童话中的没有穿衣服的皇帝。它们可以对有关本国境内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规则和立法施加影响，而不是站在一旁，成为他人确定的规则的牺牲品，或者成为不受约束的国际市场力量的牺牲品。

不过，到 20 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虽然大家都坐在同一条船里，但是，在滔滔海浪的颠簸下，有些人无所谓，而另一些人则很不舒服。在欧洲，尤其是这样。那些自 1800 年以来一直是过着这样日子的欧洲国家不喜欢正在发生的事情。多少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是组合主权（甚至是收集主权）。现在，要把一部分主权交出去，那是很痛苦的。每当它们闻到桌子上的东西有交出主权的味道时，它们就支吾拖延。欧洲的一些新的国家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它们喜欢这种事态发展，它们要求更大程度的一体化和更多的共同决定。

20 世纪 90 年代，全世界的战略家们发现很难找到新的话题。他们在论述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均势方面是有一套的，但是，新的威胁是什么？战略家们在和平的环境中工作，没有一个可以引起他们注意的威胁，是很难愉快起来的。他们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智力从军事战略方面引导开来。由于这个原因，很少人认识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今日的世界面临的威胁是，国际主义并不

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社会。

智力的精英们自 1945 年以来策划了从民族主义向国际主义发展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伟大变动之一。民众也跟着走了，这不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场变革的意义，而是因为劳动分工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欧经济的一体化是在经济空前大发展和民众、工人的福利连年提高的情况下发生的。亚洲的奇迹也是这样，它起初包括日本，后来包括南朝鲜、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四小虎，在最后阶段也包括中国。由此可见，每个人都上了这条船，因为很明显，每个人的生活都改善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增加福利的老办法被证明仍然有效：受惠的人可以为那些不支持这个措施的人付出代价，而自己的生活仍然得到改善。

与这个事态的发展并行的是，在国际上可以看到制度化。不仅贸易和资本流动这样一些基本的经济因素从国家水平上升到了国际水平，而且控制基本经济因素的立法框架也跟着如此作了，虽然略微滞后了一些。欧洲人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展到欧洲共同体，进一步发展到欧洲联盟。这种演变反映了日益成长的、越来越强大的一体化，要求在伴随制度化框架方面有一个平行的发展。东南亚人成立了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希望发展成亚洲自由贸易区。在北美，这种演变形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所有这些机构的诞生都离不开这样的真诚强烈的愿望：要求建立国际机构来取代国家机构，因为后

者显然没有能力提供国际化的解决方案。

这正是今天的问题之所在。全世界的人们（不是政治界和知识界的精英们）提出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国际体系是否真的能够解决问题？是参加这个体系能够改善生活呢，还是最好向后转，采取民族主义的政策？这里的另一个麻烦是，对国际体系的批评往往来源于感到自己被冷落了的民族或宗教团体，也就是说，不是来源于一两个大的文明国家（它们反对西方占主要地位的国际体系），而是来源于充分参加国际化世界的国家内部的民族或宗教团体。

今日世界的政治领袖所面临的，不是军事方面的挑战。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们是有能力组合和加强这个国际体系呢，还是让世界逐步地、肯定地滑回到民族主义的束缚中？

同样地，正如这不是一个军事性质的挑战一样，它也不像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大规模文化对抗问题（他在《外交》季刊发表的文章中以及他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不过，亨廷顿关于文化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效的，因为对国际体系的很大一部分敌意确实是来自欧洲和北美范围以外的文化或文明。但是，这些文化往往是作为少数派在世界上一一些国家内部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在欧洲和东南亚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而正是在这两个地区，一体化进展得最快；也正是在这两个地

区，可能出现反弹。

在欧洲，对一体化的敌对和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留恋发生在极左派和极右派身上。只要政治上的多数派坚定地支持一体化的进程，这种情况就没有什么危险。然而，在一体化的死硬反对者和坚决支持者之间出现了一个怀疑派，他们的犹豫不决阻挠了一体化迅速取得进展，获得成果，从而打掉欧盟反对派的基础。工人、农民、渔民以及移民想要知道，一体化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在某些情况下，答案是：夺去他们工作的是根本性的国际主义，而不是用来控制它的一体化。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总会发生的。但这种解释并不能安慰失去生计的人。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主要是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大量移民涌入西欧国家。移民的规模被这些国家的传媒和极端主义人士大大歪曲了。移民的总数在这些国家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少超过 5%。移民所获得的福利待遇当然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但也远非负担过重。任何一个殷实的社会应当是能够对付这些问题的。迄今为止，这就是西欧所发生的情况。

但是，今天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的西欧人问自己，如今也比较公开地问他们的政治家，现在的国际体系是否是恰当的。它是否能够产生应有的结果，提供就业机会，保证社会和文化的安全？政界和知识界的精英们仍然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不过，由于失业率约达

10%，福利待遇也被削减，人们的忍耐程度不会是有限的。

在东南亚，货币和股票市场的危机使人们感到震惊。不管是政界的精英们，还是知识界的精英们，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方面，国际金融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感到意外。政治体制面临的未来挑战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在历史上第一次他们不得不到民众中间解释，国际主义不一定光带来经济上的进步，而且也可能导致经济上的困难。其中的某些国家 25 年来第一次出现了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这是一种完全全新的局面，需要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

这些挑战变得更加难办，不好对付，因为虽然这个危机是由于本国过度借贷造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借贷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西欧银行提供的。这方面的困难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完全转嫁在老百姓的身上。许多人认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背后有着美国（国际体系的代表）的身影。东南亚的老百姓过去从来没有想到，国际主义会带来更多的失业，因而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与其说是被他们的政治家或者政治制度出卖了，不如说是被“别人”（即国际体系）出卖了。他们像欧洲的某些人一样，提出同样的问题：国际体系是恰当的吗？国际主义能够奏效吗？我们是不是应当采取别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系统？在东南亚，提出这个问题的主要是一些国家的穆斯林居民；在

这些国家，穆斯林居民占多数，但是，占少数的华人华侨控制着相当大一部分经济命脉。

在北美，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不过，许多人认为，规模要小得多。美国国会拒绝在贸易谈判中授予总统“快车道”的权力。这表明，美国在对国际主义承担义务方面可能也达到了极限。魁北克强烈要求脱离加拿大的运动很可能获得成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很可能促使不列颠哥伦比亚也产生这样的思想。某些人认为，假如发生这样的事情，美国的西部对同不列颠哥伦比亚建立一种比较强有力的联系的建议不会不感兴趣。

目前，国际体系似乎有能力和精力继续保持下去。不过，这并非定局。西欧、东南亚和北美需要为此而作出努力。由于三种情况同时汇合在一起，所以产生了国际主义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难办的问题：

* 一些国家内部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捉摸不定，不知道在国际主义这把保护伞下是否会比在本国体系之下生活得更好一些。

* 国家某些重要的、引人注目的方面正在转向国际水平。很难理解，为什么欧洲国家的货币现在必须叫作欧元，而不是叫作（例如）德国马克。

* 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对国家提出批评，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这个国家的多数民族的一部分起来反对

他们，因而产生某种排外心理。

现在的问题是，政治领导集团似乎对这些趋势视而不见。他们忙于缔造一个更加强大的、能够满足人民需要的体系，但是，他们的大战略在许多人看来仍然是在 1990 年以前的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模式，没有能力重新集中力量把安全从军事方面转移到经济和文化方面。

只有在下述情况下，国际体系才能够维持下去：政治家们（本国的政治家和在国际上活动的政治家）能够说服持怀疑态度的人们，使他们相信，国际主义不仅可以为精英们（他们已经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而且也可以为本国的广大民众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些民众仍然有力量把他们的忠诚从国际主义转向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从而使整个国际大厦怦然倒塌。政治家们还必须能够建立某种世界管理，让人民享有充分的透明度和对国际上作出的许多决定享有民主控制权。

历史的基本教训之一是，当庞大的帝国建立起来，并且进行有效统治的时候，世界便享有和平。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帝国对它们的民众采取仁慈的态度，对少数民族也同样是这样。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就是这样；尽管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奥托曼统治的穆斯林帝国肯定是这样。从 1815 年至 1914 年的一百年全盛时期，不列颠帝国也是这样。

当这样的帝国建立起来，帝国的创建者遭到了当地人民或者其它帝国创建者的反对时，大战的危险就变成现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发生大战：1789年至1815年的法英之战，1914年至1918年和1939年至1945年两次德英之战。当帝国崩溃，过去一直处于帝国约束之下的民众蜂起云涌，于是，小规模战争、对抗和危机连绵不断。这些民众过去在帝国统治之下时一直处于少数地位，有时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来维护他们的天赋自由。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能减少危险性。

现在，世界处于最困难、最危险的境地：一些帝国崩溃了或者处于崩溃的过程中，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帝国出现在地平线上。共产党帝国（它是一种文化帝国）已经崩溃了。俄罗斯帝国（它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也是这样。受到这两个帝国压制的少数民族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起来确立自己的文化特性和政治角色，不受邻国的侵犯，因为这些邻国一向是对手、敌人或者至少是竞争者。政治的和民族主义的帝国受到崩溃的压力，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文化的和经济的帝国正在建立中。传媒大王建立了全球的娱乐网络，渗透到当地的文化中，触发了关于价值观的激烈斗争。跨国公司，或者叫作超国家公司，因为它们同任何具体的国家都没有联系，它们在全球控制着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比一些国家的政府还要强大得多。

战略家们、政治分析家们和政策制定者们似乎有一种牢固的观念：他们的任务就是寻找对立、冲突和对抗。克劳塞维茨有一个主要论点，即：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的这个论点显然构成思想上的牢笼。冷战一结束，政治家们就开始在思想上探索另一种威胁、另一种冲突。他们的这种努力在 1993 年得到了奖赏，当时，亨廷顿教授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他论述“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的文章。这引起了发人深思的辩论，这种辩论有时是很激烈的。不过，很少有人提到这样的观点：人类现在面临的挑战不是互相对立，而是我们能否创立一种世界管理（world governance）来阻止冲突和解决冲突，不管这些冲突是经济性的、商业性的、文化性的，还是军事性的。自从庞大的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它们在各自的“世界”内进行了普遍的管理）以来，现在出现了第一次机会来实施我们所谓的战略上的巨大变动：从集中注意于冲突和对抗，改变为集中注意于建立合作。现在的挑战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创造空间，同时摒弃这样的看法：人类的各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幼儿园，必须防御来自其它幼儿园的男孩子和女孩子。

第二章 观点：飞轮

引言

多少世纪以来，文明的飞轮一直在技术、文化和组织之间交互变换。这种交互变换过去决定着，将来会继续决定哪些文化出现，并生存下去，哪些文化不能。

新的技术，当它从发明跃进到创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新的了。在通常情况下，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对它已经熟知好多年，甚至几十年了。它的新颖之处是，能够用它来制造产品和服务了。中国人比任何西方国家都更早地知道火药了。古罗马人很早就知道蒸汽的力量。但是，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罗马人，都没有聪明到懂得如何应用这些科学的“玩意儿”。什么时候获得突破，从懂得技术发展到会应用技术，以及在何处出现这样的突破，这要由文化和组织来决定。

如果在一个讨厌应用新的发明创造的社会里出现发

明创造，那么，即使是最引人注目的发明也会被埋没的。在一个“僵化的”社会里，任何引进新技术的努力都会被扼杀。我们所处的社会越僵化、越停滞不前，那么，越有可能把发明创造当作不受欢迎的怪物而抛弃。在这方面，需要有一个可塑性强的社会，才能吸收新的技术。例如，18 世纪下半叶和 19 世纪初的英国。在克伦威尔时代，英国发生了革命。又过了 150 年，英国发生变革的条件才成熟。相比之下，法国虽然不久也发生了革命，但它仍然是一个拒绝变革的僵化社会。由于这个缘故，拿破仑战争可以说是准备变革的社会和不准备变革的社会之间的战争，或者说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和一个农业社会之间的战争。

组织提供了另一个必要的条件，即透明度。在宏观上，社会由于新技术的推出而被改造了。在微观上，那些敢于冒风险的个人和集体使用了这种新技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大概知道，他们可能有得有失。换句话说，只有在有一些对每个人都适用的规则，每个人都知道并理解这些规则的情况下，新技术才能在社会上推广。这些规则必须以立法或命令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个阶段，这些规则究竟是议会通过的，还是国王或一个独裁者批准的，这并不重要）。西欧和北美差不多 200 年来一直是这么做的；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罗马法的传统，这个时间甚至更长一些。另一方面，在那些由个人关系统治的社会里，社会秩序取决于当权的个人，各个

人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他们同那个人的关系。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知道他们是否被允许取得回报，如果新技术的风险变成利润的话。在欧洲和北美工业化期间，这样的制度流行于世界其余的大多数国家。实际上，今天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仍然是如此。一般来说，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把个人关系改变为法治。

今天，我们看到所谓的工业社会正在改变为许多人所谓的信息社会，其实，应当叫作非物质社会。新技术当然产生了许多影响。不过，本书认为，决定性因素是，它割断了作为工业社会之特点的地理联系。在我们非常熟悉的老工业社会里，生产、资本、劳动力和信息全都联系在同一个地理地区内。供需双方并肩存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彼此都很熟悉。他们互相需要对方。他们彼此非常信任，因为没有外来的证据证明可以抗衡对方的地位。在非物质的国际化世界里，所有这一切都颠倒了。需求的一方往往是当地社会并不完全了解的国际力量。另一方面，供应者或者生产者不得不进入国际市场，因此，不得不在当地的劳动力不很理解或者不大接受的条件下进行生产。当地的劳动力不理解他们同国际市场的联系（迎合别的地方的消费趋势）对当地社会的生产者（他们必须争夺全世界的消费者）的竞争力意味着什么。生产者不一定需要当地的劳动力。当别的地方的条件更好的时候，他们可以把他们的生产设备迁走。构成劳动力的消费者需要生产者提供就业机会，他们也